



# 唐献陵 石犀趣谈

□ 樊波

自古关中帝王都,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唐王朝,就是以关中长安为统治中心,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大唐帝国。经历过从繁荣到没落的唐代帝王们的陵寝依次坐落在今天关中的蒲城、富平、三原、泾阳、咸阳、礼泉、乾县境内,这十九位帝王的十八座陵墓,通称“唐十八陵”。这些陵墓多因山为陵,气势恢宏,陵前至今保存着大批诸如华表、翼马、羊、驼、鸟、鞍马、虎、狮、文武侍臣等陵墓石刻,其中不少作品被看作是中国古典雕塑的典范,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的献陵石犀就是这批石刻雕塑品中较大的一件。

献陵,位于陕西三原县北四十华里的永合村,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身为开国之君,李渊深知暴淫骄奢之弊,故在遗诏中专门讲到自己死后的陵寝“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所以当年仅在陵园四个神门外各置石虎一对,南神门外立华表和犀牛各一对,东神门外设石佛龕一个。唐代帝王陵墓石刻的题裁相当广泛,但在唐十八陵中,仅献陵立有石犀,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献陵石犀(如图),质地为陕西富平一带产的青石,通长 340 厘米,身高 207 厘米,是用重约十吨的整块石料雕琢而成,体态巨大,

(西藏地名)马,1994年 7月 2日《参考消息》转载米歇尔《为了寻找那传说中的马》一文,他说在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下受命寻找唐代文献所载的那种上等良马,他们在甘肃天祝找到一种叫查科里的马,这种马自出生之日始,就能使同侧的两腿同时举步前行(这可能就是畜牧专家所指的马),但这种马并非纯种

藏马。1993年他们又在西藏玉树和涓公河源头找到一种纯种马,它们“个头小,耳朵也很小,面额短,毛细,四蹄小而硬,背部平坦,耐力极强,跑速快”,“无论奔驰,还是同侧两腿同时举步,还是在平原上或在高达 5400 米的山坡上,我们都对它进行了考验,其耐力和特点符合

传统良种马的要求。囊谦马是西藏特有的马……”。白陶马体态体貌确与其有相似之处,故此说并非无稽之谈。

以上三说,各持一端,使白陶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看来谜底的解破,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了。

(作者通讯处: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造型生动 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陈列的这只石犀是于一九六〇年入藏的。犀牛头部表现为目、合口,鼻上有一象肉瘤似隆起的犀角,脚上有三趾,犀牛作缓步走动姿态;右前足石座侧面上有三行字,由于岁月久远,磨泐较甚,仅能辨出“□祖怀□□德”字样(经专家考证研究,以为原文应为“高祖怀远之德”)。在移存前,石犀常年侧身倒伏在地,腿被折断,身躯几乎半掩土中,所以今天看到的石犀身体右侧风化磨损严重,左侧则清晰地刻有整齐的鳞甲纹和不规则的圈纹。《尔雅》云:“水犀之皮则有珠甲,山犀无之”,似乎过去有一种身上长有鳞甲的犀牛,但动物学的研究并未证实这一点。对于这些纹饰,一般都认为可能是艺术地表现犀牛全身重迭的有韧性的厚皮,并非写实的手法。这件石犀虽然体型高大,但比例却比较恰当,反映了当时的雕刻家对这种动物造型的整体把握。他们并不过分注重细部的精雕细琢,但在表现犀牛特点的关键面上,处理手法极为高妙,例如全身迭复的厚皮及项部下垂的厚皮,雕刻的简洁而生动;身体上的鳞甲纹和圈纹,给人视觉上形成一种花斑的感觉,从而部分弥补了雕刻不能表现色彩的缺陷。最近还有研究认为,这头石犀可能是以当时国外进贡的驯犀为原型塑造的,所以作品中线条与纹饰的处理代表的是驯犀在表演时所佩的装饰品,并非所谓犀牛的厚皮。当然,不完全写实的手法也有这种可能,即雕刻家并未亲眼目睹过犀牛的面貌,仅仅凭借着当时人对犀牛形象的传闻或史籍上的描述加之个人的想象力完成作品,如把犀角表现为肉瘤状的隆起,就可能来源于唐人对犀牛的模糊认识。

犀牛是一种珍贵的动物,在现代的亚洲,还生存有苏门犀、印度犀和爪哇犀三种犀牛,前者是双角犀,后两种为独角犀。献陵石犀的形象可能表现的是爪哇犀一类。今天,犀牛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但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在华南、华北地区都产犀牛。在史前时代的遗址中多次发现犀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刻的“𧇧”字,

经研究代表的就是“兕”字,即犀牛。在出土文物中,犀牛形象也屡见不鲜,如山东寿张出土的商代“小臣犀尊”,造型就是一只憨态可掬的苏门犀,四川昭化出土的秦(或汉初)金银错犀形铜带钩、涪陵西汉墓出土的犀灯、陕西兴平出土的错金银铜犀尊也都是以犀牛为造型的文物。从殷周时代开始,犀角就被用来做兕觥,犀革则是铁铠兴盛以前最上好的铠甲原料;到了兵戈相攘的战国时代,战争对犀甲需量大增,犀牛被大肆捕杀,加之其生殖率低,致使犀牛在我国特别是北方地区迅速减少。至秦汉,犀牛在北方已不多见,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犀牛已经绝迹,所以西汉平帝、东汉章帝、和帝时史籍中都有外国献生犀的记载。到了唐代,华南地区仍有野生的犀牛,《新唐书·地理志》列出了澧、朗等州的土贡方物中有犀角一项,这时人们多用犀角来作腰带上的装饰品,即犀角带<sup>𧇧</sup>,唐代宰相李德裕就曾撰《通犀带赋》,称赞犀<sup>𧇧</sup>之高贵。追求犀<sup>𧇧</sup>的热潮伴随着犀牛的大量捕猎从唐到五代持续了近三百年,直到北宋才被金<sup>𧇧</sup>所代替,而犀牛经历了这场浩劫后,终于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灭绝了。

在唐代,犀牛已很罕见,一般人对犀牛的认识也很模糊,有关犀牛也衍生出了“却尘犀”、“辟水犀”、“夜明犀”种种神乎其神的叫法,工艺品中出现的犀牛也多被刻划的走了样,献陵石犀在总体特征上把握的基本不走型确实不易。唐人见到的犀牛,多为国外贡品,《旧唐书》中就记载了林邑(今越南中部)国王“贞观初遣使贡驯犀”,如果献陵石犀有原形可寻的话,极可能就是这类犀牛。李渊之所以雕刻犀牛于陵前,可能是对这种大型动物的喜爱,同时最大地满足他夸威德于当代,名垂后世的心愿。由于对长安水土气候的不适应,这些来自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贡犀常常夭折,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驯犀》中就曾记述了贞元年间南海进贡的犀牛在上林苑中“角骨冻伤鳞甲缩”,最终被冻死的故事。

(作者通讯处:西安市三学街15号西安碑林博物馆)